

## Column

■长短集

## 灾后争议撞击主流价值观

面对大灾,善良的心和勇敢的行为值得大力褒奖,但理智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索更需要提倡。震后一连串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争议问题,留下了太多值得好好吸取的教训。行善体现的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祝福和对他人的真切关切,一旦善举成了别人的聚焦点甚至被拿来攀比,这善举早已大大蜕化变了味!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这些天来围绕诸如捐款管理、大灾预测与应急、倒塌楼房质量、80后的团体精神等问题的思考与争论,让我们回味无穷。是的,面对大灾,善良的心和勇敢的行为的确值得褒奖,但理智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索更需要提倡。

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泉之一。这里的氏族社会不指代什么具体社会阶段,而是体现为家族制、宗祠制的社会形态。此时,人们不仅受到同样文化的精神洗礼,而且在困难时也会有相互帮扶的事实。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虽然近年来这种精神遭到了金钱至上观念的强烈冲击,但要将其彻底从中国人心中完全剔除出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不是技术,难以复制,总是与特定地理空间之上的生命体相联系。汶川地震之后所显示出的同胞相助之情,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也会呈现出新的继承性变化。面对地震之后的钱款捐助管理问题,许多人纷纷要求应由与政府无关的独立社会机构依法管理捐助的钱款。西方国家目前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效率很高。这样的观念认定,由政府管理捐助款很不合理。一方面,不免将与政府财政相混淆,以致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混淆;另一方面,面对捐款,很难说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历史根源。中国政府的管理体系是在历史上是信托制的,即相信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做好事情。而且,这种管理模式是政府与民众共同认可的,至少在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比较成熟,基于社会监督的契约性管理模式就成为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必然选择。

在历史文化绵延传递过程中,中国这种政府信托式的捐款管理模式继承了下来,在社会缺位的前提下,这种管理模式也没有被打破的动力,这便造成了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分歧。其实,不同的捐款管理模式在实质上本无差异,都是为了更好帮扶弱势群体。但效率的差异,却是与外在的因素密切相关,如外在的监督、法制的约束等等。显然,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并不是匆忙地构建一个非独立运作的、有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要循序渐进地改革。一方面加强账目管理的透明度,并对其进行专业审查与监督,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机构的独立与完善,直到一个健全的、独立的社会体系形成之后再实施全面的社会化管理。

此外,在震后的话题中,对于公众人物捐款数额的讨论也是非常多的。不少人在网络上对一些名人的捐款品头论足,有极端者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笔者无意责备这些评论,因为他们也是出于对灾情的关心,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有能力人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正如,有人曾经援引电影《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来为自己的言语证明。殊不知,能力大小并不能与金钱多少相挂钩。莫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告诉我们,切不可攻击善小者。古人云,孝者,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同样,在从事善举时,不应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别人的善举,要报以感恩的心态。试想,为抗震救灾,“一人有难,八方救援”的善举正塑造着一种良好社会风气,而攻击和评议却又掀起一种社会暴戾之气。这是多大的讽刺!

在人们竞相捐款的过程中,许多单位张贴了光荣榜,这个小小的榜在某些时候成为引发争议的大事情。笔者曾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家医院里,一位护士在第一时间里以无记名的方式向捐款箱里投了五千元,事后在反复查证下,这位护士的善举终于被单位同事所知。但是,在第二次捐款时,这位护士却只捐了100元。其实,前后的反差并不是某些人所说

的这位护士从热烈到冷漠的态度转变,而是因为捐助本来就是善的表现,当善不为人所知时,行善体现的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祝福和对他人的真切关切,一旦善举成了别人的聚焦点甚至被拿来攀比,则这善举早已大大蜕化变了味!

同样的情形,又有人拿中国人和外国人做比较,仅仅因为外国人的捐赠通常普遍要比中国人多,便认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精神和善良品行。事实上,这种理解大有问题。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代际传授,一是性善论。中国人家族观念很强,非常重视

代际间的传与授,捐赠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比如,黄金满囊,不如遗子一经。在这里,“经”是获取黄金的途径,比黄金重要,因此需要传给子孙。而西方人通常更重视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公私之别,故捐赠动机大于传授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孔孟之道是以性善论为基点,这种善就是与人为善,在必要的时候,捐助又会不断发生。而西方文化传统是以性恶论为基点,因之捐助、赠与便成了赎罪的主要手段,西人捐赠之风遂大规模形成。

震后这一连串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争议问题,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的教训。在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当下,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更需要立足未来,不要总是在事发后才去规避不良的态势,这样只能伤害更多人的心。

■买房者说

## 开发商身段渐放软 楼市还能挺多久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房地产事务专栏作家

楼市形势正变得越来越糟。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虽然主流开发商们眼下还没有走到寅吃卯粮的地步,但我们已经目睹了这样的景象:一年之前还倨傲无礼的开发商们,现在非常愿意掏钱换取报纸的广告版面,借此告诉人们,如果现在不从他们那儿购买房子,那么投桃报李,会给予相当丰厚的回报,比如获赠价值超过10万的轿车。

出现在北京的这则报纸广告,真实地折射出开发商们的焦虑之心和险恶处境:如果在短期之内无法挽回人心,要么坐待衰败,要么同业贱卖,这似乎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唯一两条可行之路。

重要的不是那些从来就无力支付的早就绝望了的未入市群体,而是大多数曾经试图举债购买的人们,他们现在终于逐渐停止了因为不明缘由的惊吓而导致的疯狂、冲动的步伐,变得犹疑起来。这些曾经备受惊吓的羊群们,如今开始安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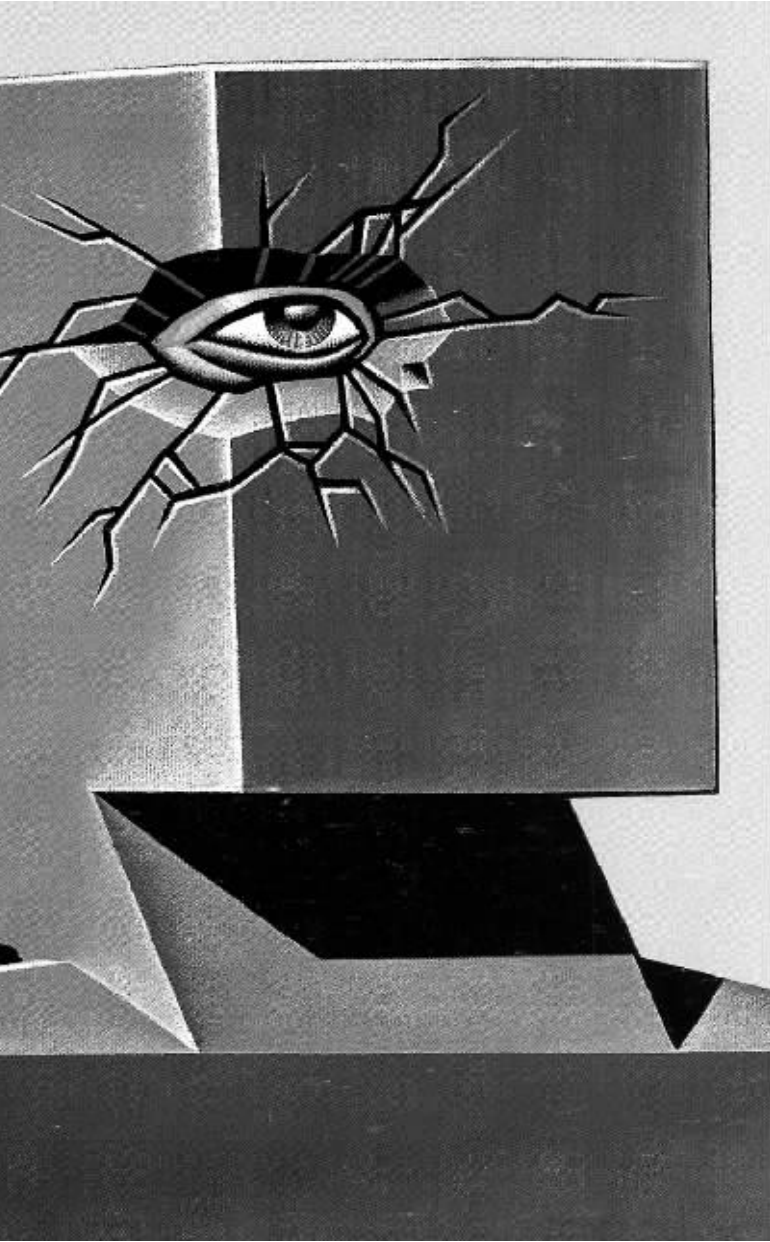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在投资者和炒买者中间怀疑情绪开始滋长。风水转得真快,当前这样一个时刻,持有房产已不再一件幸福和荣耀的事情,多数人对此产生了困惑。持有房产简直就像手握炸弹,引线却不由自主

掌握。问题就是这样,持有得越多、越久,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里就越危险。谁也无从预料何时会被哪一种外力引爆。整体市场的趋于冷静,实在就是一个明显而危险的信号,显示那些持有房产的专业炒家和投资人正身处境境,谁持有越多房产,谁将面临相应的不幸。

投资者和炒买者的信心流失,将对市场产生致命性的重创。这些市场的强硬支撑力量正被瓦解。他们会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行动。五月已过,往常年份同期的火红市场景象不复再现,预计这些绝望的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加紧抛售。因为谁都想尽快脱离险境,远离不确定风险。

炒买资本的这最后一波疯狂将把市场拖入深渊。从前这些人是疯狂地吃进,未来将是疯狂地抛出。市场因疯狂而兴盛,也将因疯狂而衰落,何其的宿命?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某种内在的因果逻辑,施之以疯狂,必将遭到疯狂的回报。炒房者的抛售,将迫令开发商走上倾销自保的路途。

目前还看不到局势的好转,或者应该说坏的预兆才刚刚开始,谁也不清楚会如何恶化下去。这不仅



■彼岸

## 拉瑟特走了,美国主流媒体公平更少了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访谈节目《与新闻界对话》的主持人蒂姆·拉瑟特6月13日下午在工作中突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拉瑟特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华盛顿主任,《与新闻界对话》每周星期天上午播出,接受访谈者均为美国政界、政论界顶尖人物。拉瑟特已经主持该节目十多年,在主流媒体周日的竞争中,他胜过其他所有竞争对手。

58岁的拉瑟特是当之无愧的主流媒体的最重要的主持人。虽然在加入媒体以前曾是民主党的一员干将,但拉瑟特被认为是最没有“党性”的主流媒体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上了《与新闻界对话》,都会被拉瑟特问到非常尖锐的问题。此外,拉瑟特还有一个特殊提问技巧,那就是会在对方回答问题后,把对方过去曾说过话放在屏幕上,显示出对方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美国顶尖政客们仍然争先恐后地上拉瑟特这一最有影响的政论节目,尤其是那些正在选战中的政客,更非得经过《与新闻界对话》这一关不可。今年以来,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先后都上过《与新闻界对话》。凡在节目中有良好的表现者就会给竞选加分,当然,如果表现不好,也会丢分。由于拉瑟特对两党人士都会提问同样尖锐的问题,大家也就没有什么抱怨的。有时候,拉瑟特还把对手同时请上《与新闻界对话》,让双方当面过招,拉瑟特自己则当裁判。

拉瑟特的极少偏见,使他在身后得到了极为特殊的待遇,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左、右两边都对他有极高评价,都为美国主流媒体失去了一位巨星而痛心。目前,人们都在猜测谁将继任拉瑟特位置,人选有一些,但都多多少少的偏向自由派的民主党。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实在很难找出一位如拉瑟特那样持论公允的媒体人,大家都有点怀疑,没有拉瑟特做主持人,《与新闻界对话》是否还能保持其权威和公平。

当然,美国主流媒体的许多人始终不承认自身的偏见,但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偏见长期存在。前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滋生记者博兰·哥登伯曾写一部畅销书《媒体的偏见》,哥氏以自己多年的经历在该书中揭露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上的自由派偏见。哥登伯举例说明,媒体可以通过选题和寻找采访的对象,在报道中去隐藏自己的观点,比如,媒体找专家谈一个问题,如果觉得这个专家的意见不符合记者的意愿,可以继续寻找下一个专家,直到找到符合记者意愿的专家为止。此外,本来应该是客观报道的媒体记者在报道中附带评论,并将评论的观点作为事实呈现给媒体消费者,进而大大影响消费者对新闻的消化。

有几十年工作经历的哥登伯以知情者的身份大曝内幕,当然有更大杀伤力。哥登伯因此被主流媒体认为是一个“叛徒”;其实,哥登伯因不满主流媒体的报道偏见,先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批评主流媒体的评论,结果招来横祸,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在哥伦比亚公司的工作,哥登伯也不含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那篇评论改写成了一本畅销书。

标榜客观、公平的美国主流媒体并非能做到客观和公平的新闻报道,作为平衡,在美国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条款下,主流媒体以外的新媒体包括福克斯等有提供新闻的权利,从而有利于打破主流媒体的垄断,造成一个有竞争的媒体服务环境。福克斯的大老板默多克看了长时间主流媒体的自由派偏见,他推出的偏向保守派的福克斯新闻自然就很快占据了不小市场份额。

■大英小语

## 伦敦“哈莱姆”在多元化下新生



◎李俊芬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管理顾问  
现居伦敦

2个月前,我受邀参加了旅英越南华侨协会创会20周年庆典,去了平时很少有机会去的布里克斯顿。

位于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属伦敦兰贝斯区,最初只是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居住区,其中绝大部分居民是牙买加移民的后代。从十八世纪开始,他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开矿、修路,用他们的苦难换取大英帝国的繁荣。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如今,布里克斯顿正在成为各国新移民的主要聚集地。宽容、进取、多元化成就了今天布里克斯顿的繁荣。

这个现在有许多越南人落户生活的地区,不久前,曾被英国报纸评为英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那时候,许多对布里克斯顿不甚了解的人一谈起这个地区就会色变。就如同许多人因为不了解纽约的哈莱姆区,而对这个黑人聚集区怀有某种莫名的恐惧一样。

上世纪70年代,哈莱姆区是纽约市最破旧,也是最暴力的角落。出租车司机从机场迎客进城时往往都要穿过这个街区。但在开车前,他们首先要确保从车外看不到客人的行李和皮箱,以免遭不良之

徒骚扰。但是,从1996年起,随着纽约市在打击谋杀,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泛滥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哈莱姆区渐渐甩掉了旧时的阴影。许多人认为,哈莱姆正在重返纽约的主流,你不会在深更半夜出门时担心兜里的钱包或是自身的安全。

如今的布里克斯顿实际上也是许多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从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不用离开布里克斯顿,就可以享受到。

在布里克斯顿地区最著名的人物有:英国第64任首相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英国第71任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现任伦敦大市市长列文斯通以及英国的著名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大卫·鲍伊原名大卫·琼斯(David Jones),曾被认为是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创作者,有“音乐变色龙”之称的他,总是能随着时尚潮流适时地改变自己。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也曾是布里克斯顿的住户。在这里,还有一条曼德拉克街,这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与布里克斯顿的一段渊源。当这位令人尊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走访布里克顿时,他得到的最高礼遇就是在布里克

仅取决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与外部的客观事件有着紧密关联。现时来看,四川大地震就是一个与之有紧密关联的外部事件。它至少会在一个时期内对人们那种传统的居家置业观念造成颠覆。有数据证明,中国西部的房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动摇,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大地震,已经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置业观。心有余悸的人们还没有从地震的极大恐惧中摆脱出来,价值观念系统可能已被摧毁,正在小心翼翼地反省自己是否应该继续走从前那条也许是错误的老路——毕生的辛苦,换回来的可能只是一堆毫无利用价值的废墟。开发商的生意焉能不惨淡!

房地局不得不出面为购房人做心理疏导工作,从北京等地邀请建筑专家去为购房人讲解地震对于建筑的危害,告诉他们这并不是致命的,地震并不可怕。这是迄今我看到的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也是房地局最为恪守职责的表现。只是房地局业内人士也显得过于紧张,却没有人为房地局业者做心理扶助。所以,在我看来,要这些忐忑不安的人去为另一群同样心神不定的人去做心理疏导,想来很难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倘能不给本就摇摇欲坠的市场再蒙上一层阴影,就得烧高香了。

随之同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者也要开始考虑进退问题了。至少

从目前来看,在地震多发地带,他们是缺乏发展根基的。他们的损失未必会比普通购房人少。现在有两条路需要他们做出选择,要么离开,要么继续待下去。如果只是想捞上一把然后打走人,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前者,因为此前多年间他们赚了足够多的银子,至为重要的是今后不用再呆在一个地方继续倒霉。精明的投资人都可能这样做。

那么,那些海外热钱呢?他们是否会伺机抄底,进而一头往房地产市场里扎入?不,我相信这些热钱在地震发生之后恐怕跑得比兔子还快。至少他们会立刻收缩战线,从中国西部的大片地域里面抽身撤出。估计他们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削减在中国楼市里的资金注入量,改而投向其他看上去他们自认比较可靠的领域。

形势从来比人强,抛售的会继续抛售,退出的会继续退出,止步的会继续止步。如果说,一年之前人们还因为看不清市场前景而摇摆不定,现在应该确信自己该如何选择。首要的一点,是不应该再一门心思钻入巨额利润的缝隙里面,而是应该最低限度地保证资金安全。这是一个总的战略思想,它正在成为一只无形之手,牵制着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体,成为各自做出权衡取舍的依据。当这些人逐一收手退场时,楼市又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呢?

早年就对政治感兴趣,时常在布里克斯顿的市集发表街头演说。在1964年,21岁的梅杰开始参选伦敦兰贝斯区地方议会(London Borough of Lambeth),最终至1968年,由于保守党于当年出乎意料地在地方选举占压倒性多数,梅杰因而顺利当选。之后,梅杰出任地方议会的房屋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几个地方公共住宅的发展项目。梅杰在布里克斯顿长大的经历曾被电视节目戏称为(Rankin' John Major)。

现在,布里克顿地铁站是伦敦地铁维多利亚线的南端终点站。维多利亚线于1862年正式启用,是伦敦最早的地铁线路之一。当维多利亚线第三期路线开通后,新的维多利亚线车站于1969年3月7日开幕。最初,维多利亚站为维多利亚线的临时总站,直至该线完成最后期路线工程。布里克顿站在工程完后取代维多利亚站作为总站。1971年7月23日正式开通至布里克顿。

许多建筑设计公司对布里克顿进行了专业的发展指点:有些空间,特别是布里克顿铁路站附近的空间,很少被人使用,因为那里充斥了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另一方面,商业街非常拥挤,因而行人在繁忙的车道上行走,并且常常跨越安全障碍横穿道路。布里克顿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区高度零碎,其中与商业街直接联系的街道太少。建筑设计商的出

发点旨在促进步行人流更加平均地分布在城市中心,从而增加该地区的投资潜力。具体设计是打开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拱门来增加一系列步行道连接;移开商业街的金属安全障碍,加宽步行道,以减少小商业街的交通压力。

布里克顿火车站距离布里克顿地铁站仅数十步,是连接伦敦中心和东南部大小城镇的枢纽之一,并于英格东南地区的滨海城镇连成完整的交通网络。其主要街道——布里克顿路,在短短一百米的距离内,分布了5个巴士站,连接了超过20条的公共汽车线路。便利的交通设施使得布里克顿成为伦敦南部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布里克顿,你还可以发现华人超市、中东渔市、土耳其羊肉铺等其他少数族裔经营的生意。就在地铁站周围200米内,几乎英国所有的商业银行和房屋信贷公司都有他们的分行存在。

当然,不能遗漏了当地人经常光顾的布里克顿泰特图书馆。这位泰特先生与位于泰晤士河畔的泰特博物馆的创始人是同一个人。有着超过115年历史的布里克顿泰特图书馆是泰特先生对英国文化的又一贡献。

至于电影爱好者和流行音乐发烧友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所在。外国电影节和现场流行音乐会这是里长盛不衰的元素。